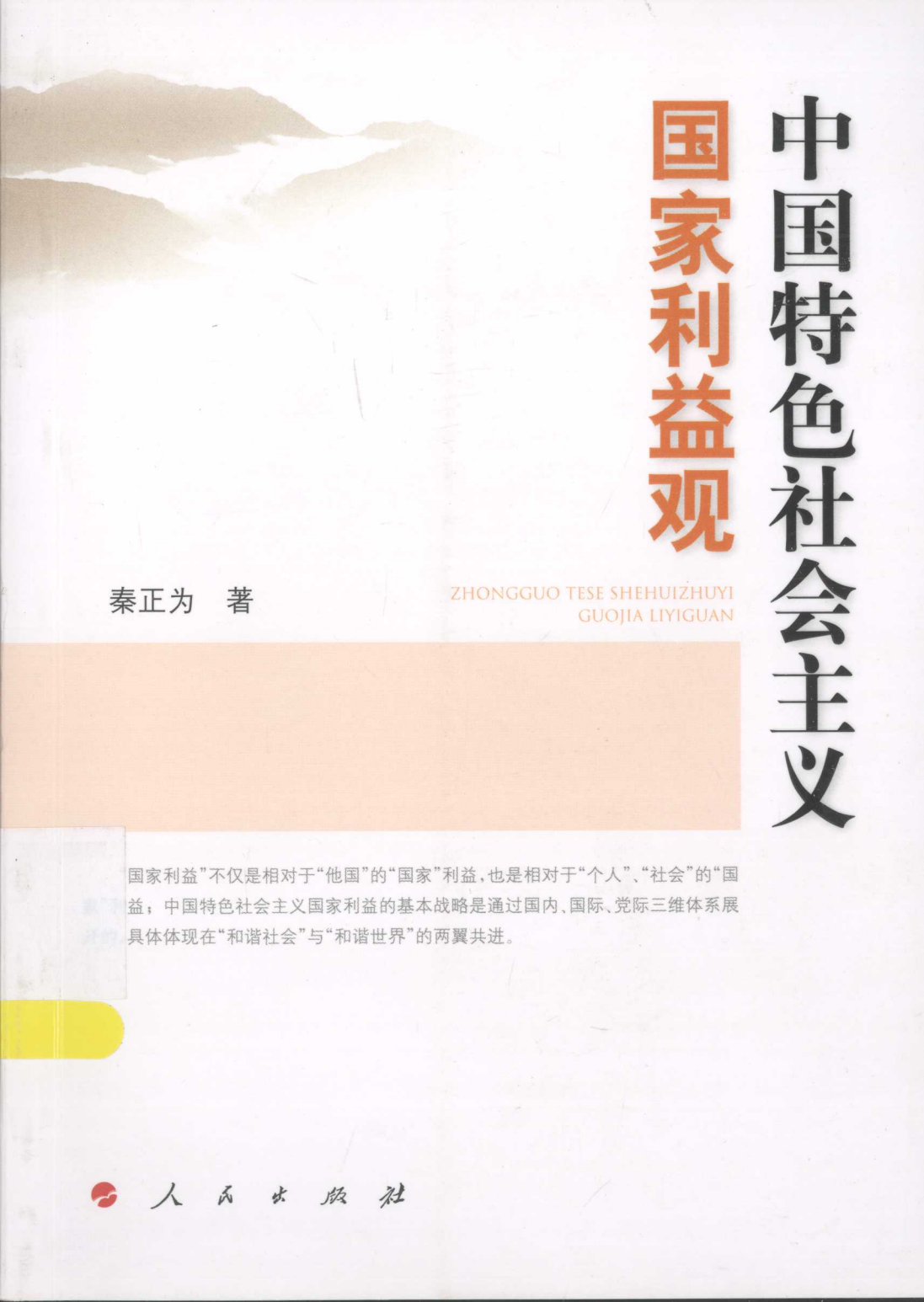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利益观

秦正为 著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GUOJIA LIYIGUAN

国家利益”不仅是相对于“他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相对于“个人”、“社会”的“国
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基本战略是通过国内、国际、党际三维体系展
具体体现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两翼共进。

014033874

D616
44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利益观

ZHONGGUO TESI SHEHUIZHUYI
GUOJIA LIYIGUAN

秦正为 著



北航

C1721673

D616
448

责任编辑:杜文丽

装帧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秦正为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890-0

I. ①中… II. ①秦…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研究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784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GUOJIA LIYIGUAN

秦正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5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890-0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自有国家以来,就有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点和核心内容。因而,在长时间的国家发展史上,国家利益也是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和核心价值。不过,在冷战时代,国家利益一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冲击和遮蔽。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各国开始更加注重国家利益,不但在国家政策和对外战略上体现出明显的国家利益原则,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中,既有关于“国家利益”概念本身的争议,也有关于如何维护、谋求“国家利益”具体战略和措施的思考,还有关于历史人物国家利益观的研究。正为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可以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和中国国家利益观研究的一种探索。

关于这一选题,有着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客观方面,国内外关于“国家利益”的关注持续高涨。以美国、俄罗斯等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均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宣扬国家利益问题,而美国将自身利益界定为全球“共同利益”的做法也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同时,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国家利益问题正逐渐引人注目。因此,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是决策层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二是主观方面,正为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研究》,在此方面已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该论文全文 30 万

字,论述全面深刻,三个盲评全为优秀,并成功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并且,他还有个长远计划,即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列宁的国家利益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贯穿起来。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他同我商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

关于这一选题,我一开始还有些担心。因为,关于“国家利益”本身就一直存在争议,什么是“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永恒的还是变动的,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未来如何发展;等等,这都是较为敏感、很难把握的一些问题。不过,经过他两年的努力,这种担心基本上如石落地了。通观整个报告,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体系完整。全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为中心和主线,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写作框架,如形成条件包括理论基础、历史影响、现实凭依、实践基础,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国内战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国际战略包括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国际组织的关系,党际战略包括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资产阶级政党、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并对其历史地位、成功经验、教训鉴戒、未来启示进行综合评析。并且,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清楚地叙写了其来龙去脉。视野开阔,体系完整,这是报告的第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也是报告的基础。

第二,思路清晰,论述深刻。整个书稿,不管是大的篇章,还是小的节目,基本上都线索清楚,逻辑严谨,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条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列宁的国家利益观;其历史影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观,论

述了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其现实凭依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述了在此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国家利益的总趋势;其实践基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视国家利益的倾向性。通过这样的分析,问题就基本清楚了,论证也就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三,观点新颖,敢于探索。本书的创新性,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本身,而且体现在具体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上。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明确提出和整体研究还未见到。其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形成条件之一的列宁的国家利益观、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利益观和主要内容之一的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也未见到有他人研究。在理论观点上,提出和强调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关于“国家利益”不仅是相对于“他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相对于“个人”、“社会”的“国家”利益;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基本战略是通过国内、国际、党际三维体系展开的,具体体现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两翼共进;等等。在研究方法上,引进和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系统论、博弈论、心理分析法等。

第四,责任明显,勇于担当。全书从始至终,透露着一种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从其初衷和实际价值看,该书不仅有助于拓宽“国家利益”的研究领域和视野,使其从单纯的国际政治领域延伸至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等领域,而且有助于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研究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及其战略的构建。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和“智囊库”、“思想库”,始终坚持“为中央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恪守“翻译与研究并重、研究经典文献与研究现实问题并重、理论研究的深入与理论

宣传的普及并重”的原则。作为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也应该具有这种责任和担当。

当然,由于该论题本身体系的庞大、内容的繁杂,因而本书在某些观点和论述上还需要斟酌、商榷。不过,总体而言,本书还是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欣闻本书即将付梓出版,是为序。

王学东

2013年8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绪 论	(1)
一、问题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2)
三、概念界定	(13)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条件	(20)
第一节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20)
第二节 历史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27)
第三节 现实凭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35)
第四节 实践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	(38)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理论体系	(43)
第一节 和平发展: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43)
第二节 与时俱进: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	(59)
第三节 求真务实: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	(74)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国内战略	(92)
第一节 国家利益与民主改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92)

第二节	国家利益与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112)
第三节	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131)
第四节	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	(151)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国际战略	(168)
第一节	和平共处与国家利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 关系	(168)
第二节	合作发展与国家利益:中国与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	(187)
第三节	睦邻友好与国家利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	(203)
第四节	国际责任与国家利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 关系	(220)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党际战略	(238)
第一节	同中求异与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	(238)
第二节	异中求同与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	(254)
第三节	求同存异与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270)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综合分析	(285)
第一节	历史地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285)
第二节	成功经验:综合协调,稳步发展	(288)
第三节	教训鉴戒:执其一端,不及其余	(292)

第四节 未来启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296)
参考文献	(300)
后 记	(309)

绪 论

一、问题缘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国家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逐渐升温,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也渐趋热烈。冷战时期,由于两大阵营的对抗,尽管各国也有国家利益的诸多考虑,但被更为突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所遮蔽。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制矛盾的相对减弱,国家利益问题逐渐凸显。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内部实行“休克疗法”的同时曾经一度“一边倒”向西方,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此后,俄罗斯逐渐调整内外政策,重新恢复其传统的东西兼顾的“双头鹰”政策。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便是国家利益。1996年《国家安全咨文》的出台是其鲜明标志,“恢复大国地位”是其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交替升级,国家利益成为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内政外交的最高准则。近年来俄罗斯“斯大林热”的兴起也多是基于对大国地位的美好回忆和铁腕人物的急切呼唤。美国则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以及兰德公司发起于1992年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利益委员会,并在1996年和2000年两次发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1997年

塞缪尔·亨廷顿发表《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在此影响下,美国的国家利益研究轰轰烈烈展开,不但出现了众多论著,还专门创办了《国家利益》双月刊。当然,美国将其国家利益界定为全球“共同利益”的做法,也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和抵制。无论如何,这场由世界政治格局巨变所引发的有关国家利益的争论仍在进行,不但其规模和深度是空前的,其内容和领域也极为丰富,既有纯粹理论政策的深究,也有精细案例事件的探讨。

在世界各国纷纷关注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共同瞩目“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而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的实质,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面指引旗帜、一种理论体系和一条发展道路,其核心理念还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核和最高准则是人民利益,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全体人民各种利益的综合协调发展,也体现在世界各国全人类利益的包容共享增长,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有机统一。因而,在新形势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一)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研究

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专门研究很少见到,即使涉及也基本渗透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和探讨之中。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的问题、城乡对立问题、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民族工业与外资的关系问题、“和谐社会”与“小康社

会”的问题、人权与民主问题、“有效稳定”与“内部制衡”问题、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問題、中国发展与国际責任的問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由于立场或角度的不同，海外学者们的观点和看法分歧较大，甚至截然相反。但总体看来，真正的学术研究还都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和评价中国的发展情况，肯定中国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如针对认为中国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论调，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左翼学者大木一训指出，中国这种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杠杆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尝试，与本质意义上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是完全不同的。^① 如针对国家与市场的问题，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② 如针对包括贫富分化和环境问题在内的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解决“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使人们在面对这些损害时达到和解”。同时，“必须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进行社会投资”。^③ 如关于人权与民主问题，英国学者阿塔尔·侯赛因指出：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实

① [日]大木一训：《中国经济の発展と現段階をどうみるか》，《経済》2004年第11期。

② 参见 Peter Nolan,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UK*, Jan. 2005。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美国学者齐迈克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认为: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早在2001年,在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大部分作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却表现出乐观的态度。郑永年也指出,“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①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也成了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The China Journal*),《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当代中国》(*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刊物上,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选举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关系;二是村民选举的政治效应;三是村民选举与公民权利意识或民主文化的关系。正是基于中国的发展成就,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②在他看来,中国寻求自主的努力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全球关系

① [新加坡]郑永年:《先有制度基础,后有民主政治》,《环球时报》2008年1月15日。

②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First published 2004 by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上的多边主义倾向,这和最近二十年来美国奉行日趋严重的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途径可以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尽管各国学者对“北京共识”议论纷纷,但基本上还是达成了如下一些共识: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由此可见,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它是世界历史上有别于西方的一条大国崛起之路,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北京共识”的基本内涵和坚实基础,还在于“国家主权和利益”,在于“包容性”、“兼容性”和“以人为本”。

随着对中国发展研究的深入,海外学者们也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如雷默的“中国模式”三定理指出:一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二是建立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三是自主理论,即“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超级大国。”法国学者托

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模式”有六个特点:(1)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2)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监督;(3)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4)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5)计划尚未消失;(6)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发展有七个特征:(1)中国共产党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2)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3)中国是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4)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显著特色;(5)中央领导层和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6)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越来越多对内职能;(7)中国正在迈向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托尼·安德烈阿尼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首先,中国经济惊人增长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其次,中国的成功是实施整个公共政策的结果;再次,中国模式似乎已经渡过危险阶段。“现在的中国模式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并且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模式的抵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瑞士学者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的六个独到之处:第一,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平衡点;第二,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取得显著成绩;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进行大胆又慎重的制度创新;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第五,改革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第六,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关于中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有“四大弱点”:一是能源和一些原材料不足;二是银行体制不健全;三是耕地面积有限;四是受到国内矛盾和环境问题威胁。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衍生出不少严峻问题,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改

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①由此可见,这些特征、经验是中国大力改革开放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结果,而问题的出现与解决也有待于各种利益关系的综合协调发展。

伴随中国发展而兴起的各种国际论调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曾指出: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正因如此,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崩溃论”、“背离论”、“神话论”、“责任论”、“替代论”、“阶段论”、“失衡论”、“对立论”、“领导论”等论调。“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挑战而非机遇,中国的国家利益威胁到世界和他国的利益;“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以不断拉大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为代价的,因而不可持续、即将崩溃;“背离论”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脱离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制度上脱离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上背离第三世界;“神话论”认为所谓的“中国奇迹”只不过是媒体渲染出来的神话;“责任论”认为中国作为西方大国的利益攸关方,必须承担和发挥相应的责任;“替代论”认为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效仿榜样的“北京共识”将替代“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阶段论”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转轨国家”的普遍特点,这些特点将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世界而消亡;“失衡论”认为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出口导向与内部需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关系的失衡,其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对立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模式在根本上是对立的;“领导论”认为国力日盛的中国应确立新的国际观,勇敢肩

^① 郑云天:《百家评说“中国模式”》,《北京日报》2010年9月20日。